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文化新论

培育好文艺和市场之间的缓冲带

□ 范玉刚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会议强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文艺的精品化和经典化的使命要求，在召唤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

文艺与市场间的“中间地带”客观存在

反思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改革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做简单区分，不利于文化发展繁荣，事实上二者在实践中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甚至相互交织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在明晰其不同运作方式的同时，洞悉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在文化发展实践中进行区别性的政策引导，明白高雅文艺创作与商业文化市场运作是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二者之间需要通过建立“隔离带”和“保护区”来健全和完善文艺生产机制。也就是说，在文艺和市场之间建立“隔离带”和“保护区”，是当前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文化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市场，但在现实运作中，市场作为交易（交换、传播）的平台，它本身有着趋利的动力机制，市场的正常运作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批量化生产来满足大众差异化需求，才能实现盈利的目标诉求。这种社会化的批量生产要求必须把艺术创作的成果，经由某种孵化机制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其路径是市场化的产业运作。这个孵化机制一手托着文艺创作的艺术卓越性追求，一手托着文化产业的社会化批量生产，它本身处于市场与文艺创作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无形却又真实存在的“中间地带”的发育状况，不仅关乎着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惊险一跳”，还关乎着对文艺生产力的保护和激励。

通常，“中间地带”不能完全纳入政府保护成为事业单位（其缺陷是效率低下和丧失活力），也不能完全商业化（其缺陷是容易市场失灵和不具有可持续性），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及其个体等诸多合力作用来建构完善的保护机制。虽然文化市场的特性必然趋于把艺术个性拉向扁平化，从而在价值上趋向大众化，这削弱了艺术创作的个性，但市场的规模化、集约化又使艺术的价值和影响力不断放大，为大多数人所消费，从而实现“以文化人”的教化功能，自由创作与市场效益之间的平衡有利于文化发展繁荣，它们共同落实于国民审美素养的提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席勒说，“艺术是自由的女儿”，而“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时，他是把艺术问题归结于审美，而“美”从来就连着“人”的根荄。当下，人的审美品位的提升和对自由感的追求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发挥。

针对“中间地带”建构保护区的探索

一个时期以来，在深化文艺院团改革中，为了降低艺术创作成本和扩大艺术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比照电影院线模式，建构文艺剧场联盟机制，以推动舞台艺术的社会化生产，来满足大众的文艺消费需求，尽力使艺术创作与文化市场保持平衡，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同时，市场机制还追求一种多样化的艺术存在，它允许探索与实验。因此，不能误判扭曲市场的逐利行为，使文艺沦为市场的奴隶；但更不能使创作完全脱离市场，甚至与市场对立起来成为市场的敌人。

艺术发展要求艺术创作追求个性化，即使一些综合性艺术形式虽然是集体创作，也要有审美个性的追求，以体现主创者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追求。这种“走钢丝”的技巧是对艺术家更高的要求，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在文艺与市场关系的框架中，要使文艺创作的个性化追求与文化生产的社会化相协调，既保持文艺的艺术水准和对卓越性的追求，又能生产出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产生社会影响力的产品，就必须尊重文艺发展规律，建构市场条件下对高雅艺术对位性的保护机制。

从文艺创作到市场流行之间存在着“断崖式”的中间地带，其中的“惊险一跳”能否成功取决于多方面条件。因此，从高雅艺术追求的小圈子到大众文化的市场消费的中间地带要有保护性隔离带，即建立市场条件下高雅艺术的对位性保护机制。通过建立隔离带和保护区及其对位性保护机制，维护高雅艺术创作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受市场侵蚀，在文艺生态健全中孵化和解放文化生产力。

保护区对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双向价值

商业价值取向的大众文化与艺术价值取向的高雅文化有着不同的运作方式和发挥作用的领域，对此的忽略或有意忽视，是误读市场滋生文艺乱象的根本原因，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没有根本理顺关系的明证。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不仅有广泛的受众，并且具有文化普遍性的外衣，因而大众文化的生产要尽量稀释或淡化民族性、地域性特色，追求普遍的价值和可通约的表达方式，以尽可能俘获更多的消费者。可见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挥作用的界域，其生产与传播主要体现商业价值取向，在经济效益的追求中使主流价值观传播最大化，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别于大众文化的高雅文艺，其繁荣虽然离不开市场，但其创作不应该直接面向市场，它不同于大众文化的普遍诉求，而是张扬个性审美色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说出了艺术卓越性与普世性关系的规律，艺术家以追求超越性的艺术价值为目标，体现文艺创作的自由，从而在其创作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独创性和创造力，这种艺术追求体现了一个国家艺术创造的整体实力和形成艺术高峰的可能性。

针对二者之间存在的这个“缓冲带”，建构一个社会性的艺术保护区，完善市场条件下对高雅艺术创作的保护性机制，应是形成全社会文艺繁荣发展的关键。市场条件下保护区和保护机制的建构，不是把高雅艺术创作置于不接地气的真空中，更不是把高雅艺术创作隔离在静态的博物馆中，而是在相互贯通和关系顺畅中实现二者的有机转换和互动。这样既可以满足大众欣赏和消费较高艺术水准的“高原”之作，也能够创造条件和机遇在“高原”之上形成“高峰”之作。唯此，才能真正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前有“高原”无“高峰”的症结点，从而既迎来文艺市场的繁荣，也会催生“高峰”之作的诞生。伟大的艺术承载着共同价值，体现主流价值观的追求，但在文艺表现形式或者艺术表达上必然有其个性化张扬，从而在艺术价值追求上体现了最大程度的文化包容性。

有所思

国学的根本在于修身

□ 钱　逊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的修养问题，做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问题是儒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修身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也是所有人立身的根本。学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上。

在修身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五点来说明。

第一点是讲“义”，就是崇德。把道德精神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放在物质生活追求前面。第二点讲“群”，乐群。在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上，要把个人当作群体的一分子，放在群体中间。不能只为个人，而是要把个人发展、个人价值、个人命运放在群体中思考。群体包括小到家庭、家族，大到民族、国家，今天以至于全人类。个人的发展要和群体的发展、群体的利益相结合，群己统一。第三点讲“和”，贵和。这一点讲得比较多，大家比较熟悉。然而对和的意义，还需要仔细思考、理解。我们说和为贵，这个并不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也不只是说，人与人相处不要动不动去斗争，不仅是简单地讲和气；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认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一个和的世界，是由多种成分、多种因素依一定关系共处一起组成的统一世界，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存在的方式。和为贵是在这样一种根本认识上提出的最高价值标准；由此，我们处理一切问题都要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处理。世界是和的世界，所以要以和为贵，要和而不同，这是和的三层含义。第四点讲“礼”，尚礼。礼是从践行的角度讲。前面讲的义、群、和这些精神在行为上落实在什么地方呢？就要通过礼。《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一切按礼去做，就是仁。礼是一种规矩；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讲礼也就是一切要守规矩。这些规矩就是义、群、和等精神价值的行为体现。为什么中国能成为礼仪之邦，就因为中国有守礼的传统。第五点是讲“耻”，知耻。《论语》上说要“行己有耻”，就是要有羞耻心。这是讲道德的基础。西方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信仰上帝。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宗教传统，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羞耻心的基础上，或者老百姓经常讲的做事要凭良心。有羞耻心，人就会有所不为，自觉不做违背道德的事；如果没有羞耻心，所有一切道德就失去基础，一个人就会无所不为。

这五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做人的基本问题。义、群是回答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和是从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提出待人处事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礼是从践行落实的角度谈；耻则是从道德的基础上谈。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体系。中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其实离不开这五点。当然，这五点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又有具体的内容，有时代的内容，所以需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造性地去理解和解释，使其有创新发展。

关于读经典，我觉得可以从读一本经典开始，比如从读一本《论语》入手。《论语》这部书应该说是整个儒学的源头活水，里面包含着最基本的东西，儒学的文化基因，而且这本书也比较容易读。当然不管学什么，要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不要求把握到一个非常系统的理论。首先是和自己实践生活相结合，逐渐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上的认识。

至于党性修养，我想其基础是做人的修养，是基本的做人的修养在共产党人身上的体现。如果不懂得基本的做人道理，基本的做人的要求都做不到，就谈不上党性修养。同时我建议我们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再读一读刘少奇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里面把传统修养的学说和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做了创新性的解释和发展。这本书在共产党的建设上面，在那个时代一些进步青年的成长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史镜

眼光向下
——五四时期的平民教育

□ 岳　亮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改革异常活跃。他们意识到“大多数民众未受教育，对于国家内政外交是无从知道的”，只有人民觉悟了，救国才有希望。这一时期，由于民主思想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国大教育家杜威的访华，共同促成了平民教育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理论学说传入中国后，更是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革教育的热情。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呼吁人人平等、自由，倡导所有人都是劳动者，都是平民；他们在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在城市乡村、学校工厂推广平民教育运动和教育实验，探寻改造社会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

杜威与平民教育

1919年至1921年，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教育家杜威受邀来华讲学。杜威在教育上主张平民主义，他在中国的演讲中指出，“世界各国，无论其为专制、为共和，必以普及教育为要图”，“因为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主义之教育不可”。在他看来，平民教育就是“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各个的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事例的人的教育”。他不仅提倡普及教育，还强调平民教育的一大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个性智能，养成健全的人格，把个人所有的特征各自发展出来。这样造就出来的国民，才是“真正共和国的国民，是真正平民主义国家的国民”。访华期间，杜威全力探讨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明确平民教育的目的乃是培养民主社会之公民，使每一分子立于平等、自由的地位，以促进个人及社会的发展。

在当时，杜威的平民教育思想受到了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北京《晨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纷纷报道杜威行踪，尤其是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堡垒的《晨报副刊》不仅全程报道了杜威访华的行踪，而且将杜威在北京和南京的系列讲座以及其他重要演说全部予以刊载，并且发表了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国内知名学者的评论，平民教育思潮开始弥漫全国。

中国知识分子的倡导

平民教育在中国渊源有自，辛亥革命前后，一些知识分子就已开始思考普及教育以启发国民的主人翁意识。蔡元培曾大力呼吁要激发国人民主意识的觉醒。陈独秀也主张教育应当启迪人民觉醒，发展人民身心。在杜威离华后，他的中国学生陶行知开始在国内将平民教育思想付诸实践。1924年3月13日，陶行知在《晨报副刊》发表《平民读书处之经验》一文，着重阐述了他对于在中国进行教育普及的一些想法。陶行知指出，中国现在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依人曾经调查，全国能识字的，只有八千万人”，而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国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国民素质，使百姓成为真正的国民的一大关键就是普及平民教育，使不能读写的人成为能读能写、智力完全的人，使每个同胞完全具有主人翁的知识能力，如此，建设创造性国家就有了稳固的基础。这种希望通过教育普及来提高国民素质，以达到变革中国的目的正是当时平民教育实践者的共同追求，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殷切反映。

在平民教育于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之际，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平民教育特刊”专栏，大量刊载国内知识分子关于平民教育的文章，进一步对平民教育的普及进行宣传。平民教育家汤茂如一再声言普及平民教育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呼吁北洋政府予以重视。他在《平民教育运动的使命》一文中写道：“我国人民中最大多数是睁眼瞎子，是不顾社会，不顾政治，未受教育的，不明学术的分子；以这种民众，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组织国家，国家紊乱，是应有的结果。”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中国作为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民众的知识程度理应比其他国家高才合乎进化的原理，但不幸如汤茂如所言，“不料实际上，中国不识字的男女老幼，竟有三万万二千万之多！不但不如欧美，而且不如日本”。因此，对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汤茂如认为不仅仅只是教没有机会求学的老幼男女识字，更重要的是完成“除文盲、作新民”两大使命。

晏阳初的千字课

1920年初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的晏阳初回国推广平民教育，他说：“中国如不能消除极大多数的文盲国民，即不能进入民主时代。”从1920年冬至1922年春，晏阳初跑了十九个省调查各地的平民教育现状，并在湖南长沙筹建了200所平民学校推广平民教育。1923年，在陶行知、朱其慧等人的支持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晏阳初被推为总干事。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萌发于一战期间作为华工应募到法国战场服务，帮助许多不识字的海外劳工写了大量家信。在他看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民有“四大病”，即贫、愚、弱、私。至于救治的药方，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眼光向下，办平民学校先教会国人识字，再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国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此造就“新民”。他把平民教育的对象首先设定为农民，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以农立国，农民占绝大多数，“要中国有希望，须乡下佬有希望，要乡下佬有希望，须乡下佬识字受教育”。在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晏阳初深刻地体会到了国民赤贫、汉字难学、资金窘迫的三大难处，只靠知识分子的吆喝，平民教育显然难以推行。为此，晏阳初设计了一种“千字课”的教育方法，依据科学的原则，从汉字中选择1000多个最常用的字，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天只需一小时，学习一课，使学生于四个月之内就能得到基本的教育，可以读书看报。考虑到农民为生活奔波，经济情况低下，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晏阳初在编写“千字课”教材时特别注意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让平民尽可能地掌握最多的汉字词汇。当以白话文编成的“千字课”教材推广后，由于其“既不多费金钱，又不高深难学，更不耽误谋生时间”，一般未上过学的平民在学习完四册教材后就基本掌握了识字的方法，因而受到广大农村平民的欢迎。此后晏阳初又根据实际情况编成《市民千字课》和《士兵千字课》，在城市和军队中推行平民教育。1926年，晏阳初举家迁至河北定县，从此开始长达11年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平民教育的反响

随着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推广，平民教育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汤茂如在《晨报副刊》撰文称，平民教育已经普及全国，平民教育促进会省分会成立了二十二处，城市分会成立了二十二处。全国平民学校与毕业生数虽尚无统计，但是根据各书局售出千字课的套数统计推算，读千字课的人当有三百余万之多。其中直隶南部高邑县平民教育推广显著，十五个平民学校中有两个女生班。国外亦有檀香山设置了平教促进会和平民学校，其他如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地，华侨皆竭力提倡平民教育。陶行知进一步建议可以“在自家内，在店内，在机关内”开办更多的平民读书处，与平民学校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教育的普及。

与此同时，晏阳初在定县翟城村的平民教育实验则吸引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名教授、作家、戏剧家、农艺师和社会学家，先后有近百位知识分子举家搬到定县。他们自愿放弃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把现代文明的火种播种到农村。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晏阳初如此写道：“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与他们的家属居住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将近200人的平民教育社会，我们所做的工作，给‘回到人民中去’这句话注入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革命的年代，越是激情的口号越能赢得喝彩，“而一帮知识分子却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脑子里装着民众的疾苦，带着《平民千字课》，一头扎到了中国的最底层——乡村，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上世纪40年代满怀激情的宣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戒和同修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